

好莱坞改编《攻壳机动队》：抽离了现实的「空城」

杜庆春

电影《攻壳机动队》回避了一个根本的问题，即“身体”本身的记忆属性。在电影里，随着记忆被植入大脑，意识和身体无缝对接，记忆轻而易举地完成了对一具陌生躯体的殖民，“他人的记忆”和“他人的感情”都轻而易举地被继承了，“人”的诞生史是如此的偶然和随意。

《攻壳机动队》的漫画和动画在二次元的领域里具有相当高的地位，经过好莱坞的改编，“数字朋克（cyberpunk）”进入真人次元，这一方面是从二次元到三次元的穿越，另一方面则是在好莱坞的全球营销娱乐诉求下，强大的电影资本对日本流行文化的“拿来”和改造。我对漫画原作和押井守的动画电影是陌生的，面对真人版《攻壳机动队》，我所关心的是三次元的电影回应“二维”美学时，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

虚构未来，首先要解决的是给观众呈现什么样的景观，《攻壳机动队》的做法是利用大量的现实元素去营造未来感，制造亦真亦幻、跨越时空和次元的混搭感。我们看到的“未来”，是一个摩天大楼与贫民窟并存的世界，实景的建筑被电子数码图叠加出未来感，光、幻影、色斑和色晕消解了整个世界的真实感，一切似乎都是不确定的。建筑本身没有东方特征，画面上的汉字、日语字母和韩语字母当然隐喻了地理空间，但只是浅表的符号混搭，真正体现出空间属性和特征的是人工建筑的“密度”——指向东亚大都会的逼仄氛围。建筑的密集性在“现实”中对应着人口规模，然而在这部电影里，“人口”或者说“人群”是消失的，密集的建筑以及由此构建的城市成为戏中人物活动的“布景”，甚至，“人物”本身也是“景观化”的，被吸收在这庞大的“布景”中。

于是，虚构的工作让渡给“景观”制造技术。大都会的交通系统和地面建筑，都成为高度符号化的空间，酒吧黑市、贫民窟街头、餐厅、高层公寓外墙密集的空调机诸多细节，它们终究仅仅是概念性的，徒有审美的意义。西方想象的东亚未来景观，是一个“密密匝匝的空城”，这个高概念的影像背后，现实其实被消解了——抽离了现实的场景，自然只能是“空”的。

在这个“密集而空”的景观里，“人”也成了一道景观。主角“少佐”是一个自我意识觉醒的机器人，这个角色的设定，非常安全且保守地沿用了“机器与人”的古老主题，也是此类题材通行的情理逻辑。原作中的少佐名叫素子，电影模糊了这个名字，完全地抹掉了角色的东方背景。影片的女主角斯嘉丽·约翰逊曾出演过漫威超级英雄系列电影里的“黑寡妇”，有一张辨识度极高的脸孔，由她来扮演“少佐”，事实上是把一张西方面孔“安全地”“不带违和感地”植入东方的景观中，在这个植入过程中，被戏称为“当代梦露”的约翰逊戴上黑色发套，她的形象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景观。

这部电影不纠结于“拥有了灵魂的机器人是否会和人类为敌”，科学和人性被搁置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爱情故事的背景，曾是一对恋人的两个人的记忆，被植入了两个机器人，这两个有了自我意识的机器人背负着“他人的记忆”，展开了对坏老板的复仇。影片叙事的推动力全然建构在“个体”情感的需求与觉醒，“密集而空”的世界成为忧郁阴暗的个体情感诉求的场域。

于是，这部电影回避了一个根本的问题：除了“意识”，“身体”本身难道没有记忆属性么？历史的本质不就是时间在个体身上的沉淀、留下印记？个体作为时间的承载者，在两两之间难道不存在匹配与冲突吗？我们在电影里看到，随着记忆被植入大脑，意识和身体无缝对接，记忆轻而易举地完成了对一具陌生躯体的殖民，“他人的记忆”和“他人的感情”都轻而易举地被继承了，“人”的诞生史是如此的偶然和随意，如同一个幻觉。

这部电影里特别有趣的幻觉是，不同母语的人能使用各自的母语实现无障碍的交流，这个场景与其科幻解释，不如说是这部跨文化娱乐产品的自我沉醉感的精彩注解。

（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本栏配图皆为林风眠画作。资料图片

《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改变对李清照其人其文的刻板印象

她不是宋朝的林黛玉

伯樵

围绕李清照的研究著述汗牛充栋，在这个背景下，新近翻译出版的《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并未为李清照研究寻觅到新史料、新文献，它的意义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把李清照及历代研究者们还原到历史语境中予以重新审视。

李清照证明了在文学创作上巾帼不让须眉绝非空言，然而面对她的文学成就，历代儒生们耿耿于怀她的再婚之事，或揶揄，或谴责，或徒劳地试图为她洗白，近现代学者们放下了“妇德”的紧箍咒，却又饶有兴致地将她作为女性的杰出代表而非去性别的伟大词人来看待——所有这些，就是李清照所要面对的才女之累。

——编者

李清照本人留下的作品不多，但在文学史上声名显赫，围绕着她研究著述可谓汗牛充栋，相对于李清照留下的文学遗产，学者们对她从身世行止到文学成就的考察可谓彻底。在这样的背景下，新近翻译出版的美国汉学家艾朗诺的《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就成了一部特别的作品——面对前人著作，艾朗诺独出机杼，针对李清照其人其文，提出了非常新颖且有说服力的见解，打破了先前文学研究著作新意创见不多的怪圈。宇文所安甚至认为，这本书恐怕会成为

李清照研究领域的“盖棺定论之作”。

艾朗诺能得到宇文所安如此高的评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宋代文学研究在北美汉学界本身是很薄弱的，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在北美学界，直到1967年才出版了第一本关于宋代文学的研究著作，这第一本著作还是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宋诗概说》的英译本。此后宋代文学研究依旧疲软，很多学者对宋代文学不感兴趣，但最终并未专注于此；比如耶鲁大学的孙康宜，博士论文大量涉及到宋词研究，但其

后学术兴趣却有所转向；再比如普林斯顿大学的高友工，开设了宋词研究的课程，却鲜有宋代文学方面的研究著作。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艾朗诺成为西方汉学界宋代文学研究方向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才女之累》或许是近30年来最为重要的一本关于宋代文学的英文著述。这部作品绝非简单地非汉语读者介绍李清照和她的作品，而是把她搁置在文学史的坐标系和性别政治的庞杂上下文里，艾朗诺的研究方法论势必将对主流汉学界产生极大影响。

中国古代大部分诗人、词人为男性，我们在阅读他们的作品时，由于性别差异，不会认为那些站在女性视角上的文学创作等同于他们的生平。当作者是身为女性的李清照时，学者们似乎一下模糊了作品中的“叙事人”和作者本人之间的界限。

花，是对美的欣赏，同时也是为了装饰自己，珍视自己的青春年华……她精心化妆，当然是为了博得丈夫的赏识，所以，买花、戴花的动作中又多了一层对幸福爱情执着追求的含义。”

如上种种漫无边际地把词作当成生平的过度阐释，在很长时间内统治了李清照的生平研究。

艾朗诺指出，与具有一定记事功能的诗不同，词这一文学体裁，有着大量的虚构和想象，不能将词的内容简单当成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关于李清照“再嫁又离婚”这一文学史公案，往来争鸣文章甚多，但很少有人跳出对事实细枝末节的争议考据，从接受史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才女之累》一书将不同时代观点所建构的社会成因、文化心理和具体表征一一剖析。

到了明代，对女性的礼教愈加严苛，明初著名文学家宋濂、藏书家叶盛都借改嫁之事对李清照予以了谴责。

到了清代，李清照词作声名日隆，其诗词创作已然被经典化，而理学色彩有增无减的清代学者们，开始无法忍受一个“再嫁又离婚”的李清照，这与他们理想中恪守妇道、尊崇名节的女性形象相差甚远。于是清人开

在那个衣冠南渡的动荡年代，李清照孤身一人守护家庭财产，争取个人自由，在男性为主导的大环境中，她凭借词、诗、文得以立足，这样一个奇女子，她的自我意识和意志是豪迈的。

《乌江》中“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对宋庭南退的时局隐喻，就更为明显了。李清照进入晚年，创作了一系列以宋代的博弈游戏“打马”为主题的文赋，在这些文章中，她将自己对宋庭政治态度和军事部署的不满寄寓到了“打马”这项策略游戏中，甚至很多文字都在直接讨论当时的战事。

艾朗诺细读李清照诗文后得出的结论，将李清照身上弱质女流的婉约气一扫而空，让我们看到了在那个衣冠南渡的动荡年代，

当然事无绝对，如苏东坡的很多词作，有明确的标题或是自序，就可以看成是具有明确纪事功能的词（如“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故事）。而大部分词作是抽离了现实事件之后的假想和遐思。最明显的例证就是中国古代文人经常愿意自比妇人或青楼女子，站在女性的视角描写闺怨、思夫等情愫，用来比附士大夫苦于不被君主赏识的怀才不遇之感。因为中国古代大部分诗人、词人都为男性，所以我们在阅读他们的作品时，由于性别差异，绝不会认为那些站在女性视角上的文学创作等同于他

展了声势浩大的“辩诬运动”，他们认为李清照“再嫁又离婚”是同时代人对这位伟大女词人的侮辱和诋毁，而他们则致力于还世人一个真实（且符合理学标准）的作者形象。如跟纪晓岚有姻亲关系的学者卢见曾，就对李白述其再嫁离婚之事的史料选择性失明。另一位学者余正燮虽然能直面史料，但他坚信那些史料都是被人“文笔劣下”篡改过的。关于李清照“再嫁又离婚”真伪的争议

的生平，至多是他们对自身际遇的一种情绪。当然也有特例，就是李煜，人们在谈论他的词作时，也多半会进行“自传式解读”。

当作者是身为女性的李清照时，学者们似乎一下模糊了作品中的“叙事人”和作者本人之间的界限。因为二者皆为女性，所以研究者们很容易就将词作中的内容，看作是作者生平的直接证据，从而将大量可能只是出于李清照想象或是诗词创作套路中的女性视角，当成了她的生平真实反映。这种自传式的解读法，在相当长时间内统治了学界对于李清照日常生活的看法。而艾朗诺提供了一种令人信服的解读视角，虽然未能给李清照生平研究做加法，但却通过利落的减法，使得李清照与她的“婉约”人生相分离，这也有助于我们体察在那个以男性为绝对中心的年代里，李清照本人的不甘、坚忍、反抗，甚或雄心的。

从清代一直延续到当代，到1980年代学界才有了比较统一的看法。这一文学史公案往来争鸣文章甚多，但很少有人能像艾朗诺这样，从接受史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

这凸显了东西学术在治学目的与方法论上的不同：中国学者注重历史的证据、事实和真伪是非，而欧美学者则推重历史的机制、语境和因果关系。

艾朗诺仔细爬梳了从宋人，到明清学者，再到现代学者关于李清照生平的种种观点，将不同时代观点所建构的社会成因、文化心理和具体表征一一剖析。艾朗诺并未倾向明显地支持任何一种观点，但他将关于李清照接受史的学术脉络和观点演进逐一厘清，丰富了我们对于李清照及其研究主题的认知。

以重新审视，让我们看到了李清照研究更多的可能性。

在充斥了道德评价和性别压制的年代里，作为女性的李清照背负了太多的社会重压。一方面她是前无古人、后鲜来者的绝代词人，另一方面她也是士大夫的贤妻、乱世中的寡妇、再婚而又离异的妇人；她证明了在文学创作上巾帼不让须眉绝非空言，然而面对她的文学成就，历代儒生们耿耿于怀她的再婚之事，或揶揄，或谴责，或徒劳地试图为她洗白，现代学者们放下了“妇德”的紧箍咒，却又饶有兴致地将她作为女性的杰出代表而非去性别的伟大词人来看待——所有这些，恐怕就是李清照所要面对的才女之累。

（作者为书评人）

